

新

獲

吐

魯

番

出

土

文

獻

上



吐魯番學研究叢書甲種之二

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

上

沈君商烈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榮新江, 李肖, 孟憲實主編.

北京: 中華書局, 2008. 4

ISBN 978-7-101-05812-3

I. 新… II. ①榮…②李…③孟… III. 出土文物-文獻-研究-吐魯番地區 IV. K877. 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7)第123642號

吐魯番學研究叢書甲種之二

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全二冊)

主編 榮新江 李肖 孟憲實

責任編輯 于濤

裝幀設計 劉麗

封面題籤 馮其庸

封面攝影 黃彬

出版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製 北京精彩雅恒印刷有限公司

787×1092毫米1/8·62.5印張·396千字

二〇〇八年四月第一版 二〇〇八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冊

定價 1800.00元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05812-3

主編

榮新江 李肖 孟憲實

編纂

張永兵 張銘心 朱玉麒 湯士華
史睿 雷聞 余欣 姚崇新
畢波 游自勇 王媛媛 裴成國
陳昊 文欣 丁俊

合編單位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序

榮新江 李 肖 孟憲實

歷史學以實證性研究為特徵，沒有史料，歷史研究就是無米之炊。新史料嚮來是史學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發掘新史料幾乎就是史學家最日常的工作之一。雖然在舊史料中發現新意也是新史料發現的一種途徑，但相對而言，近代以來新史料的發現主要依賴的是考古學。考古學資料對於不同歷史階段的意義有所不同，重視考古新發現已經成為史學研究的基本意識，對於上古和中古史研究而言，如果沒有考古資料或者不重視考古新資料，史學研究至少是存在很大缺陷的。

近代以來，古史研究的新進展或者依賴新史料的發現，或者依賴新的史學理論，而推動中國近代史學研究的「四大發現」，即甲骨文、漢簡、敦煌文書和明清檔案，確實在相應的研究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敦煌學提供的新資料是多方面的，不僅有古文書，還有洞窟、壁畫、雕塑等資料可供研究，而與敦煌毗鄰的吐魯番所提供的資料，一方面有着與敦煌相近的特點，另一方面近年更有上乘表現，吐魯番也有洞窟、壁畫、雕塑，但吐魯番學的主要支柱其實是古代墓葬，正是這些墓葬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吐魯番出土文獻（文書、墓誌等）。過去，吐魯番被人熟知的是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兩個古墓區，近年更有一些新的古墓區出現，而規模最大、未來意義更大的要數洋海墓地。洋海墓地的資料現在雖然只披露了很小的一角，就已經讓人大感驚奇。吐魯番學隨着考古新進展、新資料的不斷出現，未來的大好前景是不容置疑的。

本書就是對近些年吐魯番新出土文獻的一個整理合集。因為我們整理的不僅有古墓出土文書，也有寺院遺址出土的佛經殘片，還有墓誌，所以我們統稱之為「出土文獻」。這些文獻不僅來自阿斯塔那，還有洋海、巴達木、木納爾等古墓區出土者，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徵集的文書，應該也是出自吐魯番的古墓。我們的整理工作，按照前人的慣例，以墓葬為單位加以定名、釋文等。出土文獻，其自身也是珍貴文物，一方面考古工作提供的信息，是文獻整理工作所依賴的基礎條件；另一方面出土文獻的深入研究，又反過來推進了對考古資料的認識。本書實際上是考古學與歷史學結合的產物，我們希望我們的工作對於考古與歷史都有意義。

整理工作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三家單位牽頭，由國內多個學術機構的研究人員合作完成。這項工作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名譽院長馮其庸先生一直關懷本書的進展，還特地為本書題寫書籤。吐魯番地委、行署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始終關心和支助本書的整理和出版。地委書記孫昌華同志、行署專員熱孜萬·艾拜同志、地委副書記鄭強同志、行署副專員席克然木·吾甫爾同志等多次過問或親臨我們在吐魯番博物館的工作現場。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常務副院長孫家洲教授、副院長徐飛教授，為本書從完成到出版，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北京大學中國

古代史研究中心原主任張希清教授、副主任李孝聰教授、現主任閻步克教授、副主任羅新教授以及中心圖書館館長臧健女史，為本書的整理工作提供了諸多的方便。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更是給予了全面的 support，他們為此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鄯善文管所也為我們調查該所所藏文書原卷提供了方便。在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學術界的前輩和同仁也對本書的完成給予了巨大幫助。文獻整理完成初稿後，我們特別邀請陳國燦、朱雷、王素、凍國棟、張涌泉、黃征、劉安志等先生專程到北京參加定稿會，他們的學識與見解，為本書的完成提供了基本的學術保證。日本學者吉田豐先生為我們解讀了粟特語文書，荒川正晴先生、關尾史郎先生也為一些文書提供過重要學術意見。這部書的完成，也部分地體現了國際學術界的合作。攝影家爾冬強、黃彬先生提供了部分精美照片。我們在此也向他們表達最誠摯的謝意。

中華書局從文書整理之初，就給予了極大的關心，在出版方面更是積極熱情。感謝副總編輯徐俊先生、歷史編輯室主任于濤先生，他們多次前往工作現場，參與部分文書的釋讀並提供很多有益的建議，使得本書以美觀大方的形式呈現給讀者。

從二〇〇五年十月起，整理小組每周六集合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工作，利用照片進行整理。我們也多次前往吐魯番，利用原卷對照整理。有時一字半句的理解和錄文，都經過多次反覆查證、商量、爭論。如今轉眼已經過去兩年多的時光，在這些整理過程的日子裏，自然有很多發現的喜悅，也有長期不得進展的苦悶。雖然出版在即，我們心中仍不能因此而平靜。現在提供給學術界的這部資料書，體現的是整理小組成員的一致努力，不足之處在所難免，我們靜待方家批評指正。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近年吐魯番的考古新發現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文物局

吐魯番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古絲綢之路重鎮之一，地上、地下蘊藏着極為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早在十九世紀末，俄國的亞伯特·雷格爾、德國的格倫威德爾和勒柯克、英國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等，打着「探險」、「考古」的幌子，在吐魯番先後多次劫掠了大量的珍貴文物，在國人的痛苦與無奈之中，一門國際性的新學問——吐魯番學就這樣誕生了。

吐魯番學的誕生與發展，其每一個關鍵時刻都伴隨着大規模的田野考古發掘。如果說敦煌學的資料基礎是奠基在藏經洞的寶藏之上，那麼吐魯番學的資料基礎則是建立在若干時期對當地古遺址、古墓葬的考古發掘之上，出土文獻的主要內容特徵是世俗性、社會性，而且時間跨度大。人們利用吐魯番出土的這些文獻資料，既可以吐魯番盆地為坐標點縱向地研究從魏晉南北朝到宋元時期的歷史文化，也可橫向地研究某一個特定時期的地域關係。這些通過發掘問世的歷史文獻，為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人們提供了一個在正史資料之外研究東西方文化交流史和地方社會生活史的新窗口，而且是一個隨着考古發掘不斷深入、資料不斷積累而逐漸擴大的窗口。這是吐魯番學的突出特點之一。

吐魯番文獻的出土大致集中於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這一階段的出土文獻主要是由外國探險隊發掘、收集所獲構成，後期雖然有以黃文弼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工作者的參與，畢竟收穫不多，無法依靠這些資料構築中國自己的吐魯番學研究框架。

這一階段出土文獻的特點，一是數量巨大，出土範圍廣泛，幾乎涵蓋了現今已知的所有遺迹，這批材料構成了今天吐魯番學研究的基礎。二是時代範圍廣，從西晉一直延續到元代。三是由於特定的歷史條件，這批材料基本流失到海外，散佈在英、德、俄、美、瑞典、土耳其、日、韓等十三個國家的博物館和文化機構之中，至今仍有部分文書尚未公佈。這其中只有極少部分保存在國內，形成了和敦煌學研究一樣的局面：即吐魯番在中國，吐魯番學在國外。四是內容豐富，內容上從佛經到世俗文書，從漢語寫本到多種胡語文獻，都有涵蓋，並由此激發國際學術界對傳統漢學、回鶻語、吐火羅語、粟特語、敘利亞文、中古波斯文以及佛教、摩尼教、景教、祆教等的研究，從而造就了一批知名的學者和一批相關學術成果。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於當時在世界範圍內考古學都處在一個初創階段，加之在吐魯番進行探險發掘的各支隊伍人員素質差別極大，所以這批資料的出土地點、地層關係、埋藏情況多不明瞭或過於簡單，只能依靠字體、紙質等方面的信息去推測其時代背景和使用情況，使得這批材料的學術價值大打折扣，這也

是吐魯番學研究中的一個永遠的遺憾。

第二階段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家對吐魯番地區的文物古迹實行了有效的管理，二十世紀初葉以來的那種無序發掘得以根除。出於保護的目的，這一階段對高昌故城、交河故城等遺址進行的發掘極少，出土文獻資料寥寥無幾，但對受到大型基本建設和自然破壞威脅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哈拉和卓古墓群以及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進行了大規模的搶救性發掘，出土了大量的墓誌、文書、經卷等文獻資料。

這一階段的特點，一是工作均由中國學者完成，文獻集中出土於上述三個地點，世俗文書基本上以漢文為主，佛經類包含有部分胡語文書。二是出土文獻的時代跨度、種類和數量要短於或少於上一階段，但均保存在國內幾家相關機構中並得到了充分的研究，由此培育出中國自己的吐魯番學研究隊伍。三是考古發掘工作雖較前一階段有質的改變，但考古資料的田野記錄還是失於簡單，特別是整理工作嚴重滯後，近五十年過去了，考古報告還未整理出版，給出土文獻的研究帶來諸多不便，極大地影響了國內吐魯番學的發展進程。

第三階段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到本世紀初。由於國家實行全面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國吐魯番學的研究纔真正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培養了一批高素質的研究人員，並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研究水準直追國際學界，並且開始呈現出田野發掘與研究國際化的趨勢。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年中日聯合組隊對交河故城溝西墓地的發掘就是一次成功的合作，發掘報告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並出版^{〔三〕}，體現出新時期的高效率。

但這一時期吐魯番地區的文物保護事業所經受的壓力也是空前的。特別是近年來，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和為恐怖組織籌集資金，國內一些不法分子與境內外文物販子相互勾結，有組織有計劃地大肆盜掘文物，使吐魯番盆地的文物古迹受到嚴重的破壞。加之近年來大面積的土地開墾，長期的灌溉滲透，也使得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受到嚴重威脅。

面對上述情況，吐魯番地區文物局積極應對，加大執法力度和保護宣傳陣勢，想盡一切辦法挽回損失。這次公佈的文書材料，部分是通過清理被盜掘的墓葬後得到的，部分是從文物犯罪分子手中收繳的，還有一部分出自關心吐魯番文物保護事業的文物收藏家和當地老百姓的慷慨捐贈。

這一階段出土文獻的地點基本上是以新發現的墓葬群為主。洋海、阿斯塔那古墓二區、巴達木、木納爾、交河故城溝西墓地等新發現的文獻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雖然這些文獻資料多獲自對盜掘墓葬的搶救性清理，但由於案件破獲及時，加上考古發掘的

〔三〕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一九九四年吐魯番交河故城溝西墓地發掘簡報，新疆文物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二一二頁，又一九九五年吐魯番交河故城溝西墓地發掘簡報，新疆文物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一三

一四〇頁，又一九九六年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溝西墓地漢晉墓葬發掘簡報，考古一九九七年第九期，四六一—五四頁；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溝西墓地魏氏高昌—唐西州時期墓葬一九九六年發掘簡報，

考古一九九七年第九期，五五一—六三頁，又交河溝西——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年度考古發掘報告，新疆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センター編中國・新疆トルファン交河故城

城南區墓地的調查研究，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一〇，奈良，二〇〇〇年。

高度科學性，使這一階段獲取的文獻資料得以建立在翔實可靠的田野考古學基礎之上。

這一階段的特點，一是文獻的出土地點多是以以前不為人知的新地點，即使是一百多年前的外國探險隊也未涉足這些遺迹。二是這批文獻雖以世俗文書為主，但由於出土地點突破了前兩個階段的範圍，所以內容也往往是前兩個階段所缺乏的。通過對新出土文獻的研究，極大地豐富了吐魯番學的內涵，使吐魯番學的研究上昇到了一個新高度。三是發掘報告的整理與文書的整理研究同步進行，相互印證，使兩方面的研究都達到了全新的境界。既加速了本階段研究成果的轉化，也為前一階段吐魯番考古資料的整理與研究提供了新的推動力。四是該階段的工作無論是田野發掘還是文書整理與研究，都是由一批研究機構和高校的高學歷、高素質的青年學者完成的，部分研究領域還有外國學者參加，體現了二十一世紀吐魯番學的時代特徵。

新獲吐魯番文獻主要出土於洋海墓地、阿斯塔那古墓二區、木納爾墓地、巴達木墓地、交河故城溝西墓地、交河故城大佛寺旁以及臺藏塔，質地以紙質文書為主，還包括一部分書寫於方磚、泥坯、木板的墓誌，除了交河故城大佛寺附近和巴達木墓地出土有胡語文書，其餘均為漢文文書。這批文獻多為世俗文書，時代從高昌郡經闕氏、麴氏高昌國到唐西州晚期，以下分別加以介紹。

一 一九九七年洋海墓地出土文書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吐魯番地區文物局考古工作者在洋海清理一座被盜的墓葬，編號97TSM1，該墓位於洋海一號墓地的北面。出土了一批闕氏高昌國時期（四六〇—四八八）的珍貴文書。該墓葬形制為斜坡道土洞室墓，墓室內有兩具棺木，係夫妻合葬，除衣物疏與典籍外，其他文書均拆自墓主人三隻紙鞋，內容以帳簿為主，一組多件。有些文書正背面都有文字，另有十幾件為碎片，共計編號為三十三件。此墓北側一被盜掘一空的墓葬中，棄置一方木質墓表，隱約可見「威神城主張祖」，推測為盜墓者從洋海一號墓中取出，棄置於此，加之缺名衣物疏寫於張祖買奴券背面，則此墓墓主疑為張祖^{〔三〕}。同墓出土的隨葬品有泥俑、泥馬、木器、陶器等。

二 二〇〇二年交河故城出土文書

二〇〇二年四月，一場大風後，工作人員在交河故城城上清掃垃圾，在大佛寺附近的虛土內發現裸露出的文書殘片，文物局派考古工作人員及時進行了清理，共出土大小文書殘片八十餘片，經工作人員整理拼接為四十三件，編號為2002TJ1001—043，其中

〔三〕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張永兵執筆）吐魯番地區鄯善縣洋海墓地斜坡土洞墓清理簡報，《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〇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一一九頁。

2002TJT041 是回鶻文文書，2002TJT042 為婆羅謎文文書，2002TJT043 為漢文世俗文書，其餘均為漢文佛典寫本。

三 1100四年阿斯塔那古墓二區出土文書

1100四年三月，吐魯番地區文物局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二區南緣邊清理九座因遭水淹坍塌的墓葬，編號為2004TAM392—400。墓葬形制均為斜坡道土洞室墓，其中二個墓葬中出土文書。2004TAM395 墓墓室無棺木，地下葦席上躺着一位成年女性墓主，文書出自墓主人的紙鞋及握木、左肩、泥俑旁。有一件文書紀年為載初元年（六八九）。同墓隨葬品有木器、陶器等。2004TAM396 墓位於阿斯塔那二區南緣，西鄰2004TAM394 墓約兩米，墓室無棺木，在地下葦席上有二人，中間為成年男性，緊靠墓室北為一成年女性，面部圓潤，靠門邊的是一個未成年的女孩，文書發現在女孩頭部上方一塊橢圓形石塊前方。同墓出土的隨葬品有陶器、木器、紅棗、波斯銀幣等。2004TAM398 墓西鄰2004TAM397 墓約五米，東鄰2004TAM392 墓，墓室無棺木，地下葦席上為男女墓主，為夫妻合葬，此墓被嚴重盜擾，身首分離，在墓室東壁下沙土中發現四件紙鞋形狀文書殘片，另外在女性墓主身下也發現一件文書。同墓出土的隨葬品有木器、陶器、紡織品等（簡報正在整理中）。

1100四年六月，阿斯塔那二區中部一座墓葬被盜，吐魯番地區文物局考古工作者及時對此墓進行搶救性清理，編號為2004TAM408。該墓為斜坡墓道洞室墓，墓室頂部為覆斗形狀，頂中部有三個四方形從大到小套合的攢尖頂。墓室內凌亂，棺板亂丟在一起，地下鋪兩張葦席，上為成年男女墓主，身首異處，在後牆壁上繪有壁畫，在墓門口發現一件墓主人隨葬衣物疏，內容為令狐阿婢隨葬衣物疏。同墓出土的隨葬品有木器、陶器、銀器、銅錢、串飾、紡織品等^{〔二〕}。

四 1100四年巴達木墓區出土文書及墓誌

1100四年十月，吐魯番地區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巴達木墓地，對被盜墓葬進行搶救性發掘清理，清理被盜墓葬七十九座。墓葬分佈於南北相鄰的三個臺地上，形制可分斜坡道土洞室和斜坡道帶天井土洞墓室兩型。

一號臺地近似長方形，面積二百平方米，在塋院內第一排西南角2004TBM114 墓道內出土白坂奴墓表一方，故稱該塋院為白氏家族墓地。在此墓地清理十八座墓葬，其中三座墓葬有文書，2004TBM107 墓位於一號墓地白氏家族塋院第二排南邊第一座，與2004TBM114 延壽十四年（六三七）白坂奴墓東西為鄰。墓室擾亂嚴重，無棺木，一男一女均係成年人，身體被翻動，移位、疊壓置

〔二〕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新疆吐魯番地區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區四〇八、四〇九號墓，考古二〇〇六年第一二期，三一—二頁。

放墓室南壁下。墓室填土內發現兩件文書，一件爲漢文，另一件爲粟特語文書。同墓出土一方土坯墓誌，寫有「白願佰」三字，爲墓主姓名，同墓出土隨葬品有木器、陶器、銅飾、串珠、紅棗等。2004TBM113 墓位於巴達木一號臺地白氏家族墓塋院東南部，墓室已被盜擾，隨葬品移位，該墓內男性墓主人已被移位於墓室中部，其左脚上穿着一隻紙鞋，是用帶文字的廢紙製成。同墓出土的隨葬品有木器、陶器、刺繡、小袋等。2004TBM115 墓位於巴達木一號臺地白氏家族塋院內第二排南邊另一座墓葬，南依塋院圍溝，西北東三面依次相鄰2004TBM114、M112、M116、M117 號墓。由於盜擾，墓室內原在棺牀內的墓主均被拉出移位，爲成年夫妻合葬。在墓道的填土中發現一件文書，同墓隨葬品有木器、陶器、貝幣、銅飾、串珠等。

二號臺地由於開墾侵蝕呈不規則狀，面積約七千平方米，二號臺地位於一號臺地的南側，以田間小道爲界。臺地上共發現墓葬六十座（2004TBM201—260），其中十三座（M231—235、M240、M242—248）位於臺地東北部的長方形塋院內，在臺地塋院內外墓葬均出土康姓墓誌磚或土坯墓誌，故稱二號臺地爲康氏家族墓地，在二號臺地上出土文書的墓葬有九個。2004TBM203 墓位於康氏家族墓地西起第二排北邊第一座墓葬，北依塋院圍溝，西北東三面依次相鄰2004TBM202、M212、M213、M204 號墓。該墓爲斜坡道土洞室墓，坐北向南，由於盜擾，墓主身首分離，墓道口發現男性乾屍，疑爲從別的墓中拉出拖至墓道，墓室內葦席上發現一男一女，應爲夫婦妾合葬。由於盜擾嚴重，隨葬品全部移位，在墓室中部沙土中發現一件文書（2004TBM203:30），同墓中隨葬品有木器、陶器、冥幣、串珠等。2004TBM207 墓位於一號臺地北部中間，北鄰2004TBM206 墓，東鄰2004TBM230 墓，墓葬形制爲斜坡道土洞室墓，墓室內見一棺牀上鋪一張葦席，墓主被拉出棺外，爲成年男性，由於盜擾，墓室內隨葬品均不在原位，在墓室門口沙土中發現一卷文書（2004TBM207:1），同墓出土的隨葬品有木器、陶器、泥牛、泥馬、泥俑等。2004TBM209 墓位於一號臺地東北角，西鄰2004TBM208 墓，東鄰康氏塋院西圍溝。墓葬形制爲斜坡道土洞室墓，坐北向南，墓室盜擾嚴重，棺牀和墓室各鋪有葦席，棺牀上爲一成年男性，保存完好，但口被撬開。身上鋪蓋一幅完整的伏羲女媧絹畫，墓室口發現一成年女性，身首分離，在其腿南側發現一件文書（2004TBM209:8），同墓出土的隨葬品有陶器、木器、銅簪、紡輪等。2004TBM223 墓位於一號臺地邊緣西南角，東鄰2004TBM224 墓，墓葬形制爲斜坡道帶天井土洞室墓，在棺牀上及墓室內清理骨架兩具，應爲夫婦合葬，墓室盜擾嚴重，隨葬品很少，且均不在原位，在墓室中部沙土中發現一件文書（2004TBM223:3），另外發現一件銅鏡，保存完好，出土於棺牀下南壁處，爲盛唐時期流行的葡萄紋鏡，又有一件小陶盤。2004TBM233 墓位於一號臺地康氏家族塋院北端中間，西鄰2004TBM232 墓，東鄰2004TBM234 墓，地勢平坦。墓葬形制爲斜坡道土洞墓，室內有男女墓主，女性保存完好，周身用白色麻布纏裹，雙腳分別穿着用紙做的鞋，紙上有墨書文字，面部殘存有絲巾，應爲覆面，下身有帶伏羲女媧圖案的白麻布一殘塊。男性墓主身首分離，身體較魁梧，左脚殘斷，身上用麻布纏裹，被盜墓者拖拉到墓室的東南部位。同墓出土的隨葬品有陶器、木器、絲織品等。2004TBM234 墓位於一號臺地康氏家族塋院北端偏東部，西鄰2004TBM233 墓，東鄰2004TBM235 墓。墓葬形制爲斜坡道土洞墓，墓室盜擾嚴重，發現一具男性人骨架，無葬具，在墓道口發現一塊延昌二十七年（六一七）康姓墓誌。同墓出土的隨葬品有木器、陶器、金幣、泥人、木鴨

等。在墓室沙土中發現一件文書殘片（2004TBM234:16）。2004TBM237 墓位於一號墓地北端東部，東鄰2004TBM238 墓，西鄰2004TBM236 墓，墓葬形制為斜坡道土洞室墓，此墓為夫妻合葬，墓主均平躺在棺牀上，無擾動，呈頭西腳東，緊靠棺牀前北側的為男性，保存完好，口內含有一枚鍍金銀幣，與男性相依的南側女性亦保存完好。同墓出土的隨葬品有小陶碗、石紡輪。2004TBM245 墓位於二號墓地康氏塋院西南角，西鄰塋院西圍溝，東鄰2004TBM244 墓。由於盜擾已將墓道填土湧入墓室內，墓室後有生土棺牀，棺牀上和墓室底各鋪有「人」字形編織的葦席，發現有兩具人骨架，均被擾於棺牀下，係夫妻合葬，女性骨架位於裏面，仰身直肢。身首分離，男性墓主位於女性骨架右側，均已殘。在墓室口填土中發現一件隨葬衣物疏。同墓隨葬品有木器、陶器、覆面、串飾、銅飾等。2004TBM247 墓位於一號墓地康氏塋院南，西鄰2004TBM246 墓，東鄰2004TBM248 墓。墓葬形制為南北向斜坡土洞室墓，墓室已被嚴重擾亂，在墓室內的生土棺牀上，鋪有「人」字形編織葦席，放着兩具骨架，為夫妻合葬，男性骨架位於棺牀裏面，保存不好，女性骨架位於棺牀外面，仰身直肢，頭向西，面向北。在墓道填土中發現一件粟特文殘片（2004TBM247:8），同墓出土的隨葬品有木器、陶器、珠飾品等〔1〕。

五 1100年至1100五年木納爾墓地出土文書及墓誌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吐魯番地區文物局組織考古工作人員三次對木納爾被盜墓地三個臺地進行考古清理。一號臺地位於墓地東部，西距二號臺地約六百米，臺地呈不規則長條形，南北長四百米，東西寬九十米，在臺地中部偏南有塋院墓地一處，在塋院內北部發現墓葬四座（2004TMM101—104），東西向呈「一」字形排列，墓向與塋院方向一致。這次清理的四十二座墓葬中僅兩座墓葬出土文書計十八片，其中2004TMM102 墓出土十一片，2004TMM103 墓出土七片，均為麻紙質，豎行墨書，行體，內容有牒文、帳簿、衣物疏等。2004TMM102 墓位於一號臺地宋氏家族塋院北部，西鄰2004TMM103 墓，北依塋院圍牆，東鄰2004TMM107 墓，墓葬形制斜坡道土洞室墓，在墓道口發現一塊墓誌，紀年為唐顯慶元年（六五六），墓室盜擾嚴重，墓主身體和隨葬品均被移位，墓室後部有兩具被擾亂的人骨架，為夫妻合葬。兩個頭骨置於散亂的骨架中，骨架下發現葦席殘片。隨葬品大多移位，出土有文書、陶器、木器、金幣、泥俑、鐵器、泥馬、泥駱駝等〔2〕。

〔1〕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新疆吐魯番地區巴達木墓地發掘簡報，考古二〇〇六年第一二期，四七一—七二頁。

〔2〕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新疆吐魯番地區木納爾墓地的發掘，考古二〇〇六年第一二期，二七一—四六頁。

六 二〇〇五年徵集臺藏塔出土文書

本批文書是一九九六年臺藏塔遺址旁居民阿合買提在塔頂抓鴿子時，無意間在塔東壁上方的洞內發現的，當時文書被捲成小卷放在洞內，我們隨後派考古工作人員上去清查，未發現新的文書。二〇〇五年高昌文管所工作人員在宣傳文物法時，阿合買提主動把收藏的文書上交吐魯番地區文物局。

七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交河故城溝西墓地出土墓誌

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兩次對交河故城溝西墓地近幾年由於風蝕、盜擾等因素而裸露的墓葬進行了搶救性發掘，這兩次發掘墓葬共三十六座，其中康氏家族塋院內三十三座，塋院外發掘三座，墓葬形制分為兩種，斜坡土洞墓和豎穴偏室墓。出土墓誌五方，均為灰陶方磚，出土於墓道沿壁上^{〔二〕}。

八 二〇〇六年徵集吐魯番出土文書

二〇〇六年，烏魯木齊市一名文物收藏愛好者，主動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吐魯番出土文書捐贈給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共計八十餘件，編號為2006TZJI:001—198。

九 二〇〇六年阿斯塔那六〇七號墓出土文書

二〇〇六年九月九日至十二日，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同意，吐魯番地區文物局與自治區博物館聯合對阿斯塔那二區被盜墓葬2006TAM607發掘清理。該墓位於阿斯塔那墓群二區中部，墓葬屬斜坡土洞墓。在墓道南端入口向北一點三米東壁下出土木牌代人一件，漢文豎行墨書「此是麴倉督身」六字（2006TAM607:1）。墓道北端被盜掘，墓室口暴露。墓道南部填土中出土漢文墨書文書一件。在前室擾土中出土漢文墨書文書兩件，其中一件（長卷）保存較完整，內容為糧帳簿，年號有神龍元年、神龍二年、神龍

〔二〕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新疆吐魯番地區交河故城溝西墓地康氏家族墓，考古二〇〇六年第二期，一二—二六頁。

三年、景龍二年。隨葬品除文書以外，無其他文物。

十一〇〇六年鄯善洋海一號墓地保管站北區出土文書

二〇〇六年十月，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在洋海一號臺地新建的保護站北區清理了八座墓葬，墓葬主要分佈在臺地北區邊緣中部，墓葬形制除2006TJYM4墓為長方形豎穴雙偏室墓外，其他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

2006TJYM4墓為長方形豎穴雙偏室墓，南北偏室各葬一人，北偏室為男性，仰身直肢，頭東足西，身穿毛織的衣褲，足穿毛織的襪子。原戴有紙帽，出土時已移向封門處。身長一點九六米。身下鋪有葦席，用粗草繩將葦席與身體套住。南偏室為一女性，仰身直肢，頭東足西，右小腿被折斷移向偏室封門處。身着色彩絢麗的毛織裙衫，足穿帛襪。原穿有印花紙鞋，已被擾動，一隻散落在偏室外，一隻移向北偏室附近。身上蓋有葦席，身長一點七三米。因墓室已被嚴重盜掘，隨葬品均已移位。在墓坑底內出土有文書（男性衣物疏）、紙鞋（女性右鞋）、木梳、帶字木片，北偏室近封門處出土文書、紙帽、紙鞋（女性左鞋）等，南偏室在女性左手臂下出土女性衣物疏。

以下單位和同志為相關遺址的發掘、修復、整理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此一併表示感謝（按姓氏拼音為序）。

發掘工作：

阿不都古力	安彥蒙	韓宜林	何存禮	黃興華	李春長	李輝朝	李肖	藺濤	劉澄宇	熱西提
任新宇	舍秀紅	王會峰	王綿他	楊華	張永兵	張振峰	張慧靜	朱海生	祖力皮亞·買買提	

器物修復：

李春長	劉澄宇	任新宇	王會峰	楊華
-----	-----	-----	-----	----

文書、絲織品修復：

季秀文（首都博物館）	賈應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江玉慧（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李媛	瑪麗亞
木·伊不拉音	王亞蓉（首都博物館）	王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徐建華（北京故宮博物院）	
楊華	于子勇（北京故宮博物院）	再同古麗	張慧靜	鄭渤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書保管：

古麗努爾	胡振慧
------	-----

資料信息：

房娟 李媛 劉娟 湯士華
器物繪圖：

劉澄宇 任新宇

攝影：

張永兵

數字化處理：

舍秀紅

這批文獻資料面世後，吐魯番地委、行署非常重視資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多次指示吐魯番地區文物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抓緊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整合了國內在吐魯番學研究領域佔有重要地位的研究機構和專家學者，組成了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新疆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等研究機構的學者和研究生構成的整理小組，對這批出土文獻進行整理與研究，日本京都大學的學者也對文獻中的部分胡語文書進行了釋讀。這次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工作面臨着和此前完全不同的環境條件。初始時期，無論是經費還是人力資源，完全是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的微薄之力和相關高校、研究所同仁們的無私支持，使成果及時面世，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因而後期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與資助，使整理工作順利完成。經過兩年多艱苦的工作，整理工作大功告成！藉此機會，向參與新獲吐魯番文獻發掘、整理與研究的所有人員表示崇高的敬意！吐魯番人民不會忘記你們，吐魯番學的里程碑上將永遠銘刻你們的名字與業績。

（執筆：李肖 張永兵）

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概說

榮新江 李 肖 孟憲實

吐魯番位於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東北部，古代稱高昌。絲綢之路幹道從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到敦煌，從敦煌可以直接到吐魯番盆地，也可以經過樓蘭或伊州（哈密）到達吐魯番。再由吐魯番西行，經焉耆、龜茲（庫車）、疏勒（喀什），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南亞、西亞地區。因此，古代吐魯番地區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通道，佛教、瑣羅亞斯德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等等，都曾在此流行。公元三二七年，河西王國前涼在此設立高昌郡。四四三年，北涼餘部在此建立王國。從四六〇年開始，先後為闐、張、馬、麴氏統治的高昌國。六四〇年，唐太宗滅麴氏高昌，設立和內地州郡體制相同的西州，吐魯番成為唐朝的一個組成部分。九世紀初葉唐朝勢力退出後，這裏被蒙古高原的回鶻汗國所控制。九世紀末，回鶻汗國瓦解，部眾西遷，在吐魯番盆地建立高昌回鶻王國（或稱西州回鶻、畏吾兒王國，今人或稱西回鶻王國）。本書所刊文獻所屬的時代範圍，主要是從高昌郡到唐西州時期（公元四至八世紀）。

吐魯番地區為山間盆地，氣候乾燥，除了交河地區比較潮濕之外，大多數遺址的古代文物能夠保存下來，不論是埋藏在佛教寺院、洞窟中的，還是民居、墓葬內的，即使是在中原地區容易腐蝕的絲綢、紙張，都能因此保存下來。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吐魯番盆地就是考古學者的樂園。俄國的克萊門茲（D. A. Klementz）、奧登堡（S. F. Oldenburg）、德國的格倫威德爾（Albert Grimwedel）、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英國的斯坦因（M. A. Stein）、日本的大谷探險隊，都在這裏發掘到大量的古代文物和文書。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新疆考古工作者配合當地農田水利建設，在阿斯塔那（Astana）和哈拉和卓（Khara-khoja）古墓區進行了十三次發掘，獲得大量從高昌郡到唐西州時期的古代文書。以後，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又有少量的發掘。

吐魯番盆地是個聚寶盆，古代文物和文書仍在不斷出土。一九九七年，吐魯番地區文物局考古工作者清理了洋海一號墓，出土一批闐氏高昌王國時期（四六〇—四八八年）的珍貴文書。二〇〇四至二〇〇六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巴達木、木納爾、洋海等墓地又相繼出土了一批文書。同時，吐魯番地區文物局又陸續徵集了近十多年來從吐魯番地區流散出去的古代文書，其中除了一組來自臺藏塔之外，大多數應當也是來自吐魯番的古代墓葬。

二〇〇五年十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三個單位達成合作協定，由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三人負責，組成了一個「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二〕}，開始從事整理工

〔二〕「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成員的組成具有流動性，因為有的學者一度出國，有的學生畢業分配到另外的工作崗位，同時小組成員也不在一地，所以參加整理工作的時間也不一樣，以下名單大